

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临汝县教育界的革命活动(上)

李翔宇

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,汝州(临汝)境内的省立(十中)临汝中学、私立汝阳中学、陕县高级棉科职业学校、临汝师范、豫西中等学校师生,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,为了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成立于1933年4月的省立临汝中学党支部,是汝州市教育系统成立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,也是汝州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机构。它的诞生,揭开了汝州历史发展的新篇章。

一、临汝县第一个中共党组织的建立

河南省伊阳县(今汝阳县)三屯乡东堡村人张有奇,出生于1915年,1931年考入省立临汝(第十)中学。省立临汝中学是民国时期河南省著名的十三所中学之一。在校学生大约有三百名,学生来自临汝县周边多个县市,校内师资雄厚,教师均出自国内著名大学。张有奇在校读书期间,不断阅读进步书籍,接受了一些革命思想,追求进步。同时,张有奇又通过家乡党组织中和他要好的共产党员的教育,使其逐步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,开始树立共产主义信念,下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。

1932年9月,张有奇回乡探亲期间,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成为省立临汝中学第一个党员,也是临汝县第一个党员。

张有奇返回省立临汝中学后,按照党组织要求,在进步学生中间秘密传递革命书籍,积极开展党员发展工作。经过几个月的努力,张有奇先后秘密发展王朝俊(宝丰县大营人)、王振东(郑县西街人)、刘继光(宝丰县苇子营人)、范明智(临汝县蟒川乡娘庙村人)、李贵韶(汝阳县人)、高鑫(汝阳县内埠人)6名党员。他们在县城西北的报恩寺,秘密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。

1933年4月,经中共洛阳中心县委批准,建立中共河南省立临汝中学支部委员会,支部共有党员7人,张有奇任支部书记。党支部受中共洛阳中心县委领导,由支部书记张有奇与伊阳县共产党员李林川单线秘密联系。

1934年5月,上级党组织遭到破坏。临汝县党组织因失去上级组织的领导而无法继续活动。但是,中国共产党的进步思想却影响了校内的许多学生。

二、省立临汝中学的学潮运动

1934年春,时任省立临汝中学校长王福由,治校严谨,办事公道,不畏权贵,对进步思想比较宽容,在师生心目中既是品学兼优的学者,又是严慈相济的师长。由于他在招生中坚持以优取

人、不徇私情,得罪了一些权贵。省教育厅决定将他调离,任命刚刚视察过该校的省教育督学全国任省立临汝中学校长。

省教育厅的任命书,又引起广大师生的强烈不满。体育教师张子步、数学教师周法曾、美术教师雷育斋等进步教师幕后策划,共产党员学生王振东,进步学生王力民、马庆森、刘守礼、杨昌、刘波涛、张中正、何善性、樊长庆等活跃在学生中间。经过酝酿串联,一场“驱全国王”的学潮运动全面爆发了。

当天晚上,100多个学生集合起来,冲破黑衣警察的阻拦,直奔国民党临汝县政府。面对群情激昂的抗议学生,时任国民党临汝县长崔友韩,不得不表面答应,第二天给省府去信,要求收回成命,满足同学们的要求。

全国体到校半月后的一天夜里,王振东、刘守礼、马庆森、何善性、王力民、刘波涛等40多名同学包围了他的住室。经过同学们的勇敢斗争,无计可施的全国体,只好写了辞职报告并交出学校印章。

第二天夜里,同学们又集合队伍,到县政府请愿,要求撤掉全国体。伪县长崔友韩假惺惺地接见学生代表,答应向省府请示。

请愿后的第三天夜里,崔友韩以“煽动学生闹事”罪为名,逮捕了杨昌、刘守礼、马庆森、刘波涛等17名学生,关押40天之久。这次学潮,就这样被镇压了。

在广大进步师生的强烈要求下,省教育厅被迫收回成命,答应同学们挽留进步校长王福由的要求。这次学潮运动,锻炼了进步学生,为日后临汝革命活动的开展打下良好基础。

三、省立临汝中学时事研究会成立及活动

1936年,全国政治形势正在发生剧烈的动荡。新任省立临汝中学训育主任徐逸民,思想激进,秘密培养汝阳籍学生葛洛(现代著名作家。曾任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,《诗刊》副主编,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、常务书记,《小说选刊》主编等职务)等一批进步青年学生,找他们谈话,介绍《向导》等进步书刊让他们阅读。

西安事变发生后,国共合作的政治局面逐步形成。省立临汝中学的30多名学生,在徐逸民的倡导和帮助下,成立了一个时事研究会。葛洛参加该会的组织工作,后来又被大伙推选为会长。他们凑钱订阅《新华日报》《解放》《群众》杂志以及《统一战线教程》《大众哲学》等大量进步书刊。他们利用课余时间,举办学习讨论会,联合时局谈感想、谈认识,学习革命道理,坚定抗日救国的

决心和信心。时事研究会的成员们,除了组织学习外,还经常利用节假日,组织宣传小分队,到城关镇集市上和城郊农村,向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。

1936年寒假,大家都留在校继续组织学习和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。起初,迫于国共合作的政治局面,省立临汝中学当局对于时事研究会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。随着政治形势的复杂演变,学校当局便对进步学生的活动进行压制。

当时,省立临汝中学有位东北籍的教师,名叫刘去仇,抗日意识强烈,为人耿直,时常在课堂上停止讲课,慷慨激昂地向学生讲抗日义勇军的故事,宣传抗日。他深受同学们的爱戴,学校当局却要解雇他。在他离校赴洛阳的那天清晨,时事研究会的骨干们把大部分同学动员到学校操场上,要整队为刘老师送行,以表示对校方的抗议。学生队伍走到学校大门口,发现校门已经上锁。葛洛和时事研究会的骨干找来石头砸锁,迫使学校当局派校役把校门打开,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,实现了为刘老师送行的计划。事后,由于受到校方的干涉,徐逸民也不再公开支持时事研究会的活动。1937年7月,时事研究会会长葛洛因生活所迫,离开学校,该会自动解散。

四、全面抗战时期临汝县教育界党员的革命活动
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中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及中共河南省委等上级领导机关,派王象乾、雷明等共产党员来临汝县进行革命活动。

1938年1月,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雷明以《解放日报》《行都日报》记者的身份,到临汝接替王象乾的工作。雷明通过国民党进步军官杨福堂、韩润甫的关系,在河南省立临汝中学、私立汝阳中学等学校接触学生,了解进步青年,动员青年学生胡克慎、毕澄溪、毕金溪、刘仁明(鲁山人)、范景明、王思众(河北人)、王化学(王力民)、刘桂林(刘波涛)、韩润甫、马云涛、裴国柱(时尧)等10余人到延安抗大学习。

洛阳师范学生杜善行(汝州城区人),1938年1月在洛阳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,经豫西特委负责人吴芝圃委派,回临汝县开展党的工作。杜回临汝县后,在纸坊乡留王店任小学校长。教书期间,发展教师王朝栋、于书策、王凤娥、陈云度等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同年4月,杜继甫(汝州小屯人)在洛宁县立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,经吴芝圃决定派回临汝县开展党

的工作。杜回原籍小屯乡李湾村,先后在李湾村和周围各学校发展教师杜聚扬、杜波、马全、杜聚才、王瑞林(鲁山县人)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这些党员,在教学过程中积极传播马列主义,秘密进行抗日宣传工作。

省立临汝中学总务主任马浩卿早年参加革命活动,与省内外革命同志有联系,相继保护了王晓舟、王润黎、张旺午、李协民、张晓初等革命同志。学校教师大力宣传抗日,各科教学联系抗日战争,进行爱国主义教育;利用节假日编写壁报、漫画刊物张贴大街,宣传抗日;利用地方集会表演话剧、鼓舞,宣传鼓动民众抗日热情。

五、教师党员成为中共临汝党组织的骨干力量

根据1938年11月召开的“滏池会议”精神,中共豫西省委决定派中共伊阳县委书记何启光(现名张德群)和参加“滏池会议”的贺崇升,到临汝县组建中共临汝地委和中共临汝县委。

1939年2月下旬,何启光从滏池八路军兵站来到临汝,经组织介绍,住在临汝县城教员教师杜善行家。通过杜善行与党员教师王朝栋、杜继甫取得联系,发展青年教师李岱为中共党员。接着,在杜善行家建立了中共临汝地委(代号信字地委,辖临汝、鲁山、郑县、伊阳、嵩县、宝丰6个县),何启光任地委书记,贺崇升任副书记,王象乾、彦云为委员。同时建立了中共临汝县委,何启光兼任县委书记,王朝栋任组织委员,李岱任宣传委员,杜善行任统战委员,彦云兼任县委妇女委员,杜继甫为县委委员。

根据中共豫西省委、临汝地委关于发展党员、壮大党的组织的指示,中共临汝县委深入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团结各方面的抗日力量,开展抗日救亡工作。何启光在临汝县庙下小学,通过地下党员庙下小学校长张永汉,做国民党庙下区区长王召武的工作(王召武与张永汉是朋友关系),加强临汝县西部庙下、临汝镇一带政界和教育界的统战工作。王召武在党的统战工作影响下,积极支持抗日工作。

1939年4月,共产党员李广兴到庙下小学任教,在区长王召武的支持下,主办农民识字班,共办两期,每期20人。在教学中,李广兴采用规定的教材,在农民识字过程中,穿插抗日内容,教唱革命歌曲,如“游击队之歌”“流亡三部曲”,还把延安抗大校歌“黄河之滨”改为“汝河之滨”,在学员中进行教唱,激发大家的抗日热情。并从识字班中发现积极分子进行培养。

1939年7月,临汝县委委员、庙下小学党支部

负责人杜继甫,在纪念“七·七”事变活动时,利用和国民党庙下区长王召武的统战关系,由王召武主持召开“七·七”事变纪念大会,讲抗日救国的道理,号召群众募捐。杜继甫还组织教师排演话剧、书写和张贴抗日标语,使广大群众受到深刻的抗日教育。

临汝县委组织委员王朝栋在蟒川乡半扎街民权小学,发展武清理等5名党员。他们利用课余时间,书写张贴抗战标语,传阅抗战书籍,进行抗日宣传。县委妇女委员彦云,通过国民党临汝县妇女会桂友筠等进步人士,在县城东关举办失学儿童和妇女识字班,参加的妇女有几十人。在学习班上讲抗日的道理,动员妇女参加社会活动。

1939年,私立汝阳中学教师、共产党员王子珍(镇平人)、何晓光、邓伯瑜(即邓典文,汝州人)在临汝地委副书记贺崇升指导下,在进步学生中传阅《解放》杂志、《列宁主义概论》等革命书籍。他们在教书过程中,讲公民权利、讲抗日救国;讲周恩来、邓小平、吴玉璋、邓颖超、王明五个参议员的活动情况(当时是国共合作),组织学生写“抗日三日刊”新闻,并领着学生在临汝县城内贴过十来次抗战宣传资料。晚上,还组织学生演唱抗日救亡歌曲等活动。

共产党员任正飞担任焦村学校校长期间,共产党员李书田,经杜善行介绍到焦村学校当教师。李书田向六年级学生讲述《三民主义论》等进步书刊,发展进步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成立焦村党支部。

1939年,临汝县委把工作重点放在学校,积极、慎重地做好发展教师党员的工作,先后在县城、庙下、焦村、留王店、半扎街等地学校,发展党员40余人,全县党员达到49人。根据党员人数的增加和工作需要,在半扎街民权小学、庙下小学、留王店小学、焦村小学建立4个党支部,在汝阳中学、陕县高级棉科职业学校、李湾村小学建立3个党小组。临汝县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后,重点在学校和农村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运动。

(未完待续)
来源:汝州党史



日子长长 焖面香香

李晓伟

小时候大家生活困难,吃上一顿好吃的,能向左邻右舍炫耀几天。小孩子们更不得了,会夸大其词地四处鬼白自己的口腹之幸。

上小学时,一位同学有幸跟家长去了一趟北京,小半年时间,从他嘴里说出来的,几乎全是关于北京的话题,而说得最多的,则是北京的面条实在好吃,一根根都是用油浸过的,吃起来香极了。

缺油少盐的年代,这碗面让同学们艳羡不已了好长时间,以至于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经常琢磨:这货口中的香得流油的面,究竟是何东东。以至于时至今日,我对他口中描述的这碗面耿耿于怀。

后来长大了,经见的多了,也吃过不少美味佳肴,经过反复琢磨我才知道,这位同学口中让人流哈喇子的面,其实就是咱们常见的焖面。只不过小时候没吃过罢了。

所谓“食色性也”,不分阶层、不分民族、不分年龄的人们都离不开食物,所以焖面能获得广泛的认同,肯定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。其次,它家常。而家常是一种无法割舍的情怀,不管是从南方到北方,从国内到海外,所谓最好吃的菜,其实就是家里妈妈做的家常饭菜。

咱们中国美食文化博大精深,谁也不能否认。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人,同样各地有各地的美食,我们的美食文化也千差万别。但作为地地道道的中原人,碳水大省,生在中原,吃在中原,很多人对于焖面一直都是情有独钟。

焖面是祖国北方的传统面食,其制作工艺就一个字——焖。从烹饪技术来讲,焖出来的面,不会因在水煮过程中破坏面粉的蛋白质分子网状结构,所以焖面更加营养,口感更好,看起来也让人食欲大增。同时,焖面里有面有菜,荤素搭配,营养丰富还健脾益胃。

如果把焖面赋予文化内涵的话,那要追溯到秦朝。据

传,秦时为修长城,大将蒙恬带领10万大军驻守春坤山。蒙恬巡查周边村庄时获得启发,让将士们将饭菜一锅焖起来吃。这“一锅焖”可谓焖面的雏形,既均衡了营养搭配,又增强了将士们的体力。

后来,从各地征用的民夫、将士又将这一简捷、美味的吃法带回故里,到了宋朝时开始广泛传播于民间。岁月更迭中,智慧的先人把这一美食不断进行改良,创造出了让人流连忘返的美食——焖面。近年来焖面在市区及乡镇市场发展迅速,深受广大吃货的青睐。

焖面做起来很简单,食材也不复杂,就那么几种:面条、豆角、盐、五花肉,素的可以放鸡蛋。

各家的做法不同,但大部分人习惯先把菜炒出来,然后再焖面条。

制作时把面条放入锅内开锅,尽量让面条蓬松。豆角洗净切段;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片切丝都行。把葱姜蒜炒出香味,然后把五花肉下锅,炒至肉色变白微微出油,然后把豆角下锅翻炒均匀,放入一勺盐,酱油调色。菜炒好后,把面平摊在蔬菜上,盖上锅盖转小火焖熟即可。

有经验的人,制作焖面时先要在面上洒一些食用油,这样拌匀后的面在后期焖制时才不会粘锅。同时,焖面时加入汤汁的水量很关键,水量过多会使焖面的口感过于黏软,而加入的水量过少则有可能糊锅。在最后焖制过程中,要将面条和才搅拌均匀,保证每一根面条浸润汤汁,这样做出的焖面色泽红润油亮,口感柔韧醇香,又地道又好吃。

但焖面口感偏干,最好就一碗蛋汤。

焖面做好出锅,每一根面条都像那位同学所说,吸满了浓浓的汤汁,确实就像油浸过一样,不仅看着过瘾,而且闻着喷香。

就全国而言,河南省做焖面做得最为地道。那实在在

的一盘焖面,面条金黄,肉香扑鼻,豆角翠绿,豆芽嫩黄,少许蒜苗,只是闻一下,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吃时无论土豪还是淑女,如果不忌口,尽可能配上一头大蒜,吃一口香喷喷的焖面,配一口辛辣的大蒜,鼻尖上直冒细汗。那滋味,啧啧,谁吃谁知道。就一个字可以形容:爽。

时光流逝,可以让我们忘记一些人和事,但存在于味蕾的记忆,永远无法抹去。

如今,不管我们是否愿意,快节奏的生活总是在推动着我们不断向前。我们整装,启程,跋涉,落脚,停在哪里,哪里就会燃起灶火。但焖面那种醇厚的滋味,在漫长的时光中与故土、亲人、以及一些无法忘怀的情感交织在一起,不可替代……

正所谓:日子长长,焖面香香。



焖面

姑嫂寨

姑嫂寨建在大红寨南头的一个山头上。它咋叫姑嫂寨呢?传说古时候,大禹听说大红寨山上有许多坚实耐用的古树,就从二十里外的登封阳城来到这座山上,用豹榆、檀木、黄桦和栎树、榿树制作劳动工具,一来种田用,二来治水土。

有年夏天的一天,忽然电闪雷鸣,暴雨倾盆往下倒,大禹在大红寨山上看到南边的史庄村和田地变成一片汪洋大海。大禹急忙放出自己养的一只水鸭,骑在鸭子身上来到了那片被水淹的地方,把爬在树上和困在高岗上的人一个个救下来,放到鸭子身上,然后送到安全地带。水落之后,大禹组织人马疏通河道,放了那一片汪洋大水,让人们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。

有一天,大禹要率治水人马返回大红寨,有位年轻媳妇听说后,带着小姑子拦路跪下磕头。她说婆婆被洪水卷走,是大禹从水中救了她们姑嫂性命,为了感谢救命之恩她们愿意跟随大禹到别处治水,要是不答应就跪死在地上。大禹想着女人们跟着男人们风里雨里治水老受罪,就把姑嫂二人安置到大红寨南山头上,给她们盖了茅草房,用石块圈了寨子。安置她们住好后,临走还留下一只鸭子,让姑嫂用。大禹又带人出去斩蛟治水去了。

此后,姑嫂俩在寨上一面种地,一面纺花织布,做成衣裳鞋帽,绑在水鸭身上,送给大禹,让大禹和治水的人员穿戴。后来,当地人听说水鸭会在大红寨给大禹运送东西,纷纷扛着粮食、衣物,从北天门和南天门进入姑嫂寨,把一袋袋一捆捆东西堆放在姑嫂寨的水鸭子周围,让鸭子抓紧时间给大禹送去。水鸭子也日夜运送,走遍了大禹治水的山山水水。后来,它越驮越多,最后累死在姑嫂寨前。姑嫂二人见水鸭子累死了,悲伤过度,慢慢得病去世了。后来这座寨就叫姑嫂寨了。一直到现在,人们在深夜僻静的时候,还能听到纺花洞“嗡嗡”的纺花声和水鸭“嘎、嘎、嘎、嘎”的叫唤声哩。

来源:汝州民间故事

